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中 问题导向的基本特征*

刘文卿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中问题导向的基本特征表现为鲜明的时代性、开放性与人民性。提出与解答时代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创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提出与解答新情况新问题中形成与发展。问题导向的开放性是指由于客观物质世界与人们的实践活动的无限变化，新问题层出不穷，老问题持续发展，这就为理论创新创造了空间。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中问题导向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规定了其主体向度、价值向度与根本方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 时代性 开放性 人民性

作者简介：刘文卿（1979-），滨州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山东烟台 26400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注重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为导向来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始终贯穿着强烈的问题导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现实根据就是中国社会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中的问题导向具有时代性、开放性与人民性的基本特征。

一、时代性：时代问题的提出、解决与新时代的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①。人类的思想成果不能离开所处时代随心所欲地进行创造，只能在所处时代中进行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都是在提出与回答时代问题的过程中应时而生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中问题导向的时代性，是指理论创新中的问题源于当今时代的客观实际，立足于当今时代的要求，彰显着当今时代的色彩。

* 本文系2017年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中的问题导向研究”（17YJC10052）、2017年度滨州医学院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和2018年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问题导向研究”（18CX SXJ10）的阶段性成果。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99页。

1. 时代问题的提出与解答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生命力所在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① 对于一个时代而言，“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②。时代问题是对特定时代要求的科学揭示与概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中的最高问题，因而应该对时代问题进行真正的分析与判断。

时代问题具有主客观相统一的特点：时代问题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一方面，是由于时代问题源于客观物质世界；另一方面，是由于物质世界中的时代问题本身包含有问题成立与解决的客观因素。“每个问题只要已成为现实的问题，就能得到答案。”^③ 因为“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④。与此同时，时代问题又产生于人们在特定时代中的实践与认识活动，因而又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时代问题就是理论创新主体在关注客观问题、尊重问题的客观性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对特定时代特征进行凝练的结果。可见，时代问题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产物，提出时代问题的过程就是理论创新主体立足客观实际创造性地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表现为不间断地提出与解答时代问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并解答了人类社会“往何处去”这一“时代谜题”，科学社会主义得以诞生。列宁主义通过“分析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⑤，提出并回答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如何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时代问题。毛泽东思想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⑥，提出并回答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进行什么样的革命，怎样进行革命”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依次提出和回答了改革开放进程中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的理论创新成果。正因为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基本问题，邓小平理论得以形成，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之作。在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并创造性地提出“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时代问题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应时而生。进入21世纪后，“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时代问题深刻地呈现出来，科学发展观应运而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提出并解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时代课题中得以确立，成为新时代的行动指南。可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篇大文章的起承转合中，追问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是理论创新动力的密码”^⑦。

2. 在时代问题与理论主题的辩证统一运动中实现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不是为提出问题而提出问题。提出问题有助于推动理论创新，解决问题才是理论创新的意旨。理论主题是对时代问题的反映，是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和内外政策的重要依据。理论主题的确立和实现为解决时代问题提供宏观思路和策略方案。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理论创新主题形成的直接依据就是特定时代的突出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救亡图存是当时中国面临的最突出时代问题，因而与之相对应的理论创新主题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其理论围绕着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主题形成并发展。改革开放后，中国面临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页。

⑤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1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14页。

⑦ 刘文卿：《追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动力的密码——从习近平的“时代之问”谈起》，《学习论坛》2016年第11期。

时代问题就是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就成为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线。

综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其主题都是围绕着特定时期内迫切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来设定的。大会的主题也成为当前一段时期内的理论创新主题。从党的十二大到十九大，每一次代表大会所要解决的问题都有所不同，因而大会主题思想的侧重点也不同。但是，自从党的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直到十九大，其主题都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侧重点的不同反映出当前阶段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变化，这一主题的不变彰显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时代主题的支持。主题侧重点的变与主题本身的不变彰显了理论创新主题中“变”与“不变”的辩证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时代问题与理论主题的辩证统一过程中得以形成、充实与发展。党的十五大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二十一世纪”，其关键词是邓小平理论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六大的主题关键词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十七大的主题关键词是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十八大的主题关键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九大的主题关键词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党的十五大到党的十九大，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始终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理论主题，同时又在有侧重地解决特定阶段的时代问题中有所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在主题的“变”与“不变”中得以充实。

3. 新时代问题的提出与解答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中问题导向的时代性不仅仅体现在时代问题的提出与解决，还突出地体现在对当前历史节点上的时代问题进行合理地选择与准确地判断。党的十九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智慧对新的历史方位进行了准确判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①，并深刻分析新时代面临的问题，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与发展了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面临的时代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面临的时代问题进行了科学的概括、判断与划分。报告指出了这一思想面临的一个重大时代课题，“就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②。而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包括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③，并“根据新的实践对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页。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8页。

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8页。

一战线、外交、党的建设等各方面作出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面临重大时代问题，也面临基本问题与具体问题。从逻辑关系上看，重大时代问题包括基本问题，也包含具体问题，更为基本问题与具体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与政策指导。基本问题、具体问题是重大时代问题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反映与体现。可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面临的时代问题是重大时代问题、基本问题与具体问题的统一，是一个层次明晰、系统完整的问题系统。

(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问题导向。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出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创新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过程。

首先，如何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贯穿着强烈的国际问题导向。当今时代面临国际风云变幻、西方保护主义思潮泛起的局面，世界各种矛盾增多，人类需要共同面临诸多问题。“一方面，物质财富不断积累，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类文明发展到历史最高水平。另一方面，地区冲突频繁发生，恐怖主义、难民潮等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贫困、失业、收入差距拉大，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② 中国已经成为当前世界发展最快的主要经济体和影响力巨大的政治体之一，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需要不忘初心，继续思考中国的自身发展问题；另一方面需要继续前进，思考怎样处理中国同其他各国的关系和联系问题。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要“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从而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另一方面要考虑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从而为人类社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其次，如何认识国内经济新常态、政治新生态、文化新样态、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新常态贯穿着强烈的国内问题导向。从国内层面看，“当前，社会发展正呈现出新的特点，经济新常态、政治新生态、文化新样态‘三态’交集并存，出现了许多新问题”^③。经济新常态中的问题导向主要是“经济发展趋势应当怎么看、应当怎么办”这个中心问题。新时代的“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④，因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⑤ 成为一项重大的历史任务。政治新生态的问题导向聚焦于“我们的制度还没有达到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要求，制度执行力、治理能力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⑥。因此，新时代的政治体制改革要“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⑦。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文化新样态的问题导向的主要表现是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更加激烈。当今世界引起社会冲动、易变、浮躁心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8页。

② 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1月28日。

③ 郝立新：《植根于当代中国实践的哲学智慧——论习近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发展》，《甘肃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

④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0页。

⑤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0页。

⑥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8页。

⑦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5页。

态的因素不断增多，因而如何加强舆论引导、稳定社会预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除此之外，社会建设层面上，随着改革进入攻坚区和深水区，各种矛盾交织叠加，重大问题敏感程度增大，影响稳定的社会问题时有发生。生态文明建设层面，改革开放40年快速发展积累的环境问题进入了频发阶段，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制约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层面，需要回答“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的问题，因而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最后，主要问题导向是我国进入新时代后主要矛盾的直接体现。毛泽东提出：“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①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② 因而，从内涵层面来看，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就是矛盾的表现形式。主要矛盾包含着主要问题，主要矛盾的转化意味着主要问题的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进入新时代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③。提出主要矛盾的转化，就提出了新时代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问题。

二、开放性：重大问题不断出现与发展变化为理论创新创造空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中问题导向的开放性就是指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随着客观物质世界的不断变化发展，新问题层出不穷，老问题不断发展，为理论创新创造空间。

1. 重大问题的不断出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开辟空间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④。客观的物质世界是问题产生的根源。客观世界不断变化，实践活动永无止境，因而新问题也不断涌现。丰富的、持续出现的客观现实问题不断地突破理论界限，为理论创新提供空间。理论创新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回答客观实践中提出的重大问题，满足实践发展的需要。

毛泽东在回应“中国人民如何站起来”的问题后，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进行了初步探索，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开辟了新征程。我们在对社会主义“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⑤的追问与解答中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进程。建设社会主义，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否则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前进”^⑥。那么“什么是我国今天最重要的新情况，最重要的新问题呢？当然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⑦，即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⑧ 面临如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一问题，党提出“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是最重要的政治保障。进入21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39页。

②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80页。

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2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0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9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9页。

⑧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4页。

世纪,面对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和中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改革实践对人们思想的影响以及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斗争带来的影响等重大问题被提上了日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回应这些客观问题中产生,并成为“深化理论探索的崭新起点”^①。在这个崭新的起点上,“如何切实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②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同时,还有许多重大课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回答,科学发展观在解决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中应运而生。进入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大量是新出现的问题”^③。“新问题每时每刻都在出现,而且多数又是我们过去不熟悉或者不太熟悉的。出现这样的状况,是由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引起的。”^④“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就是客观世界的变化,就是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不断发展。面对世界变化与实践活动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着重解决什么问题”^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在持续回答层出不穷的、需要着重解决的、突出的新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并开辟了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是一个向客观世界与实践问题开放的理论体系。客观世界与实践活动的变化发展决定了问题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表现为前后相继的问题的纵向关联性和彼此影响的问题的横向联系性。问题的出现往往不是零散的而是系统的,不是孤立的而是有联系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⑥。从事实的整体性与相互联系中去掌握现实问题就是唯物辩证的问题观。

2. 重大问题自身的发展变化,为理论创新提供新视角、新工具、新方法

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物质世界中的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与发展,因而问题自身也随之不断地变化发展,这为理论创新提供新视角、新工具、新方法。

(1) 重大问题自身的发展变化表现为对同一问题的持续解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过程中存在着一些处于根本性地位的、重大的老问题,对于这些老问题,特别是对于已经取得共识、获得答案的老问题,往往需要倍加重视,因为熟知未必真知。它们不是以一种静止的形态存在,而是呈现不断发展变化的态势。越是根本、重大的问题,生命力越是强大,其意义也就越大,越需要重视并不断加以反思审视,因而理论创新也就越会发生突破性进展。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历久弥新、在现实中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与内涵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史就是对这一根本性问题不间断地回答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与科学运用;改革开放伊始,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⑦的科学论断;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认为“必须与时俱进,继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⑧,“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⑨;胡锦涛带领全国人民在理论创新的道路上接续奋斗,创造性地提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

①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77页。

②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76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401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401-402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75页。

⑥ 《列宁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64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2页。

⑧ 《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35页。

⑨ 《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39页。

央在理论创新的道路上砥砺前行，坚持和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虽然理论创新在不断变化发展，但是中国共产党在不间断地把握“每个时代的不同的特征”中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问题进行持续探索，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

(2) 重大问题自身的发展变化性还表现为老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或者呈现新的表现样态，从而催生了解决问题的新视角、新工具、新方法。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问题从建党伊始就是党高度重视的问题，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发展到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的全面建设，是共产党对自身建设思想的不断发展与创新。时至今日，随着信息技术的使用与网络的普及运用，党的建设面临着新的变化与特点，老问题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如何网络强党”这个问题被提上日程，这也就产生了值得探讨的新问题，需要探索解决新问题的新方法。

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中的理论”^①，我们面临的问题也是发展中的问题。问题是发展的，因而发现、筛选、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主张应该不断地适应问题的发展变化，主张在发展中认识、理解和解决问题，即要立足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又要关注不断变化的老问题，在持续回答和解决“老问题”与“新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理论创新。

三、人民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中问题导向的主体、价值与方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中问题导向的时代性与开放性充分体现了理论对时代的要求与客观现实的尊重。然而，源于客观世界开放性、时代性问题的提出与解决却是植根于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与认识活动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中问题导向的人民性，就是指中国共产党立足客观实际，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提出和回答“谁进行理论创新”“理论创新为了谁”“理论创新依靠谁”等根本问题，创新与发展了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1. 理论创新中问题导向的主体向度：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

如何认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社会历史观的重大问题，也是事关问题导向的主体向度问题。唯物主义群众史观第一次彻底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从而与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和资产阶级的“人民主权论”区别开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创造历史的“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②。“现实的、活生生的人”首先是指人民群众。列宁也认为，是人民群众自己创立了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毛泽东指出，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历史发展不断表明，人民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剧作者”；既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

人民群众在理论创新中的创造性作用表现为人民群众在实践中有意识、有目的的进行创造性活动，并从中总结经验，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原初理论形态。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就是要“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③，并在实践中“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④。“实现目的的意志”支配人民群众提出自己的诉求。邓小平曾经指出：“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8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8页。

实践中提出来的。”^①“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中就包括人民群众在追求自己的目的的实践中提出的问题。

然而，原初理论形态形成后还需要实践主体对实践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和理论提炼，才会形成精炼的、系统化的新理论。人民群众的理论创新往往是对其创造性实践活动自发的、感性的、不系统的实践经验的描述，而缺乏对实践经验的规律性概括和总结。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认为，新东西绝不是从某个人的头脑中钻出来的，而是群众和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是，群众与集体的智慧还是没有经过加工的原料和半成品，还需要“有能量、质量，有认识、思维能力与实践能力，有历史认识需求并将之付诸实践活动的人”^②对其进行总结与提炼。共产党的队伍中不乏这样的领袖和先进分子。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善于学习，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与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因而能够熟练而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国共产党在9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涌现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一批杰出的领袖，形成了理论创新比较稳定的集体（这一集体在现实中除了指领袖集体，还表现为中央领导集体组成的中央领导机关）。毛泽东认为，中央领导机关就是制造思想产品的工厂。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没有半成品，就不能够制造出产品。而“原料或者半成品”指的就是人民群众中形成的原初理论。可见，人民群众提出的问题就是一颗颗珍贵的散落珍珠，怎样使之连贯起来变为人民的自觉意识，上升到理论自觉，则需要领袖与党的组织发挥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中的每一个理论都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群众提出的问题的系统化与理论化。

2. 理论创新中问题导向的价值向度：回应与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

两大主体力量的“历史合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中问题导向的主体向度，解决的是“谁进行理论创新”的问题。而理论创新“为了谁”的问题是理论创新中问题导向的价值旨归，是对人民群众诉求的理论回应与解答。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③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中必须要牢牢把握的一条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问题导向就是以“回应与解决人民问题为导向”，是对人民群众根本诉求的理论回应。毛泽东思想科学地回应了人民群众对“如何站起来”的迫切诉求，邓小平理论是对人民群众“如何富起来”的强烈关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党“如何建设起来”的热切呼唤，科学发展观是对人民群众关心的“如何发展起来”的理论映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切了人民群众对国家“如何强起来”的期待与向往。

可见，只有体现人民意志，符合人民利益的理论创新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才能实现真正的理论创新。理论只有满足人民的需要、解决人民的现实问题才能变成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满足人民的需要越充分的理论，实现的程度就越彻底。脱离人民需要的理论无论概念如何新颖，话语如何动听，也只能是灰色干瘪的、没有生命力的。“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④

①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53页。

② 宁可、汪征鲁：《史学理论与方法》，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68页。

③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④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3. 理论创新中问题导向的根本方法：以人民为中心的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

理论创新中问题导向的主体意志与价值旨归的实现需要切实可行的路径与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领导方法与工作路线。它为理论创新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从而最终使理论创新成为必然。

问题只有“从群众中来”才是真问题，因为人民群众的实践贴近自然、贴近生活、贴近客观实际，以人民为中心的群众路线源于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因此，从群众中来就是从实践中来。人民群众提出的问题最能实事求是地反映人民在实践活动中产生的呼声与意愿。解决问题的方法与策略只有“到群众中去”，才能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实际行动，成为解决问题的武器。把人民群众提出的问题集中起来，经过理论创新主体的努力，形成解决问题的政策、方法、思路后，“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①。正确的意见和真理性的认识为群众所掌握，最终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以人民为中心的群众路线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问题导向的始终，并在实践中得以坚持与发展。第一，毛泽东思想一贯强调想问题要从群众出发，提倡“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②。正是由于共产党提出与实行了群众路线，人民战争成为克敌制胜的法宝，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取得了胜利；也正是由于群众路线的正确实施，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才得以充分调动，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中取得重要成果，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第二，邓小平理论始终把“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拥护不拥护”作为制定方针政策的出发点与归宿。如对乡镇企业的态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如何对待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党中央把处理这一问题的权力下放给了农民，调动了基层和农民的积极性。农民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创办新型乡镇企业，吸纳了农村百分之五十的剩余劳动力。党中央在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基础上，形成了运用创办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正确方法，再把这个正确方法推广开来，广泛运用，充分坚持和发展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科学工作方法。第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世纪之交，改革开放日益深入，面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党如何能够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问题提上日程。这鲜明地体现在如何面对非公有制经济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如何面对社会生活与群众工作中出现的新变化等问题上。新出现社会阶层的呼声如何得以倾听？他们的利益如何反映？对于非公经济中的人员迫切需要加入党组织的心声如何回应？他们加入党组织是否会影响党的纯洁性？这一系列问题都是人民群众提出的迫切需要解答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党中央提出“充分调查研究，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努力改进工作”^③，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以极大的理论与政治勇气提出新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应该吸收新阶层的优秀分子入党的思想。第四，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新世纪新阶段，面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并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④。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运用，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在网络上表达需求，如何充分考虑网络民意的问题就对群众路线这一工作方法提出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9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99页。

③ 《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22页。

④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5页。

了新的要求。十六届中央政治局2007年1月23日在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就提出了网络文化的思想，并在中央集体学习中得到完整阐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在互联网时代有了新的表现形式。第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以人民为中心，并“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①。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体现于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脱贫攻坚工作就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脱贫攻坚工作就是要解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短板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党中央围绕“扶持谁”“谁来扶”以及“怎么扶”等问题实行精准扶贫，确保让人民群众对改革有更多获得感，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以人民为中心的群众路线在新时代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应用与发展。

参考文献：

- [1] 王伟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 [2] 李崇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共产党的90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 [3] 田克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轨迹》，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6年。
- [4] 辛向阳：《世纪展望：事关中华民族长远发展重大问题的追问与解答》，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2年。
- [5] 侯惠勤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30年（1978—200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 [6] 梅荣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编辑：刘 影）

更 正

本刊2016年第12期刊发的《亚洲农业劳工生存状况研究：以印度等为例——访荷兰经济人类学家简·布雷曼》一文，并非王珊珊对布雷曼教授的直接访谈文章，而是王珊珊据《新左翼评论》（2015年7—8月英文版）刊登的该刊对布雷曼教授的访谈文章进行翻译而成的中译文本。

对于王珊珊的严重错误，我们已对她予以严肃批评及处罚。布雷曼教授也接受了王珊珊的道歉。编辑部就此事进行了整顿，并完善了相关审核制度。

在此，对于给布雷曼教授带来的困扰，我们深表歉意。同时，也欢迎海内外学者关注我们的刊物并多提宝贵意见。

《马克思主义研究》编辑部

2018年3月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1页。